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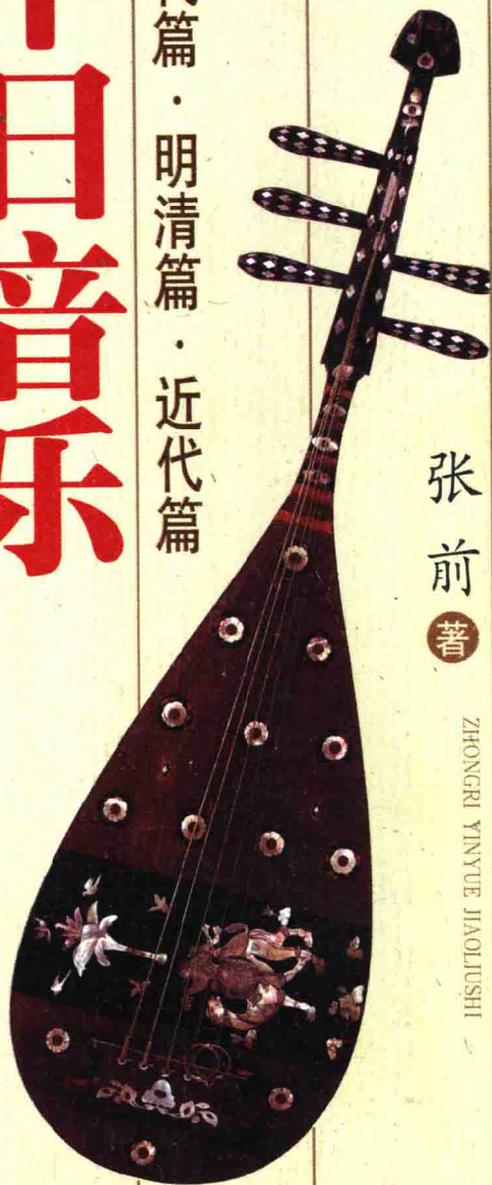
张前 著

ZHONGRI YINYUE JIAOLIUSHI

唐代篇 · 明清篇 · 近代篇

中日音乐交流史

人民音乐出版社



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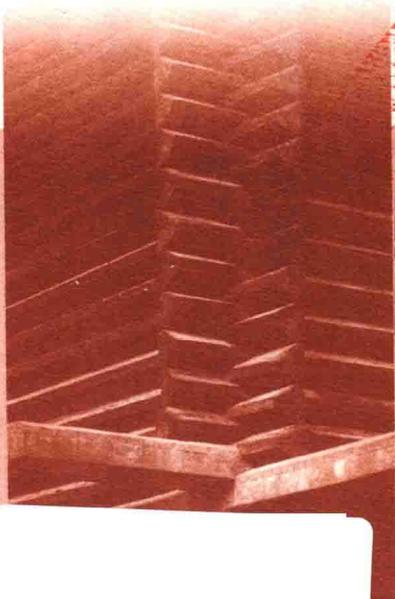
张前著

ZHONGRI YINYUE JIAOLUSHI

中日音乐交流史

樂

人民音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音乐交流史 / 张前著.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9. 10

ISBN 7-103-01951-7

I. 中… II. 张… III. 音乐-文化交流-历史-中国、日本 IV. J6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3475 号

责任编辑: 胡 蜜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翠微路 2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隆昌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256 千字及乐谱 12.5 印张

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40 册 定价: 24.20 元

前 言

中日两国的音乐交流，早在中国的秦、汉时代（公元前221—公元220），相当于日本的弥生时代就已开始。日本考古学界关于海流的调查表明，当时连接日本和朝鲜的海路已经开通，不仅日朝之间往来频繁，而且中国的人员与文化也开始经由朝鲜及其与日本之间的海路进入日本列岛⁽¹⁾。当时连接日本和朝鲜的海路有两条，一条是由朝鲜半岛的辰韩到日本的山阴、北陆地方，史称“日本海回流路”；另一条是从朝鲜半岛的弁辰，经由对马、冲之岛、大岛到达日本筑前的宗像地方，日本称之为“海北道中”或“道中”。这后一条海路开辟得稍晚些，但由于它更便利，很快成为连接日本和朝鲜最重要的交通路线，并成为大陆民族前往日本的大干线。通过这些海路，秦、汉时代的中国人开始经由朝鲜移居日本，被称为“归化人”。据日本应神朝的记载，公元400年前后（东晋时代），秦始皇的子孙弓月君率127县人来日，并带来养蚕和机织技术。后来，又有后汉灵帝的子孙、阿知使主率17县人来日，参与日本朝廷史录的制作和财政管理。这些记录虽然带有一些传说的性质，但是，当时有些中国人经由朝鲜到达日本确是历史事实，日本姓氏录中至今保留有秦、汉时代中国姓氏就是一个证明。

从中国来的移住民又被称做秦人和汉人，他们带来各种新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特别是金属器具的制造和水稻耕作技术的传播，对日本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与此同时，这些移住民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字对日本的语言文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所谓“新汉人”的到来，又传入制陶、制鞍、雕刻、绘画、编织以及刺绣等技术，使日本的经济和文化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中日人员和经济文化的早期交流中，两国的音乐交流也已开始。例如，中国制作的铜铎早在日本弥生时代即经由朝鲜传入日本，随后日本自己也开始制作，其形制与中国先秦时代的古钟颇为近似。特别是近年来在朝鲜庆州入室里发现的约12cm的小铜铎，证实了铜铎的制作技术可能是由朝鲜的辰韩地方，通过日本海回流路，经由山阴、北陆地方逐渐传入日本内地。据日本考古学的发现，从天智天皇七年（668）以来，在日本各地陆续发掘的铜铎已达300个以上，其正式记录始于元明天皇和铜六年（713）。日本正史之一《续日本记》载，这一年的丁卯七月六日“大倭国宇太郡波坂乡人，大初位上村君东人得铜铎於长冈野地而献之。高3尺，口径1尺，其制异常，音协律吕，敕所司藏之。”⁽²⁾日本发掘的铜铎形制多种多样，对于它们的用途也有不同的议论，其中这样一种说法比较有力：“铜铎最初是作为听的器物，即‘听的铜铎’而制作的，后来逐渐转化为看的器物，即‘看的铜铎’。”⁽³⁾这种说法的根据是，初期的铜铎形制较小，悬吊部分（纽）较厚，出土的舌（悬于铜铎本体内侧，通过撞击发出声音）及铜铎内侧都有磨损痕迹，应是撞击发音的证明。近年出土的许

VIII

多小铜铎也有类似的情况。而土制小铜铎的出土，则说明铜铎已从“为了听”转换成“为了看”的器物。“为了听”的铜铎从中国传入日本，说明早在中国的秦、汉时代，即日本弥生时代，两国之间的音乐交流业已开始。

中日两国早期音乐交流的另一个证明是埙在日本的发现。埙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埙，距今已有七千余年，只有吹孔而无指孔。山西省万泉县荆村遗址出土的埙已有一个指孔，后来逐渐增加为2孔、3孔、5孔。到了周代，埙已有6孔（前侧4孔，里侧2孔），并成为后世的标准形制。据日本考古学的发现，弥生时代日本已有与中国周代大致相同的埙，它们是从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海沿岸弥生遗址中出土的。1967年在下关市绫罗木乡台地遗址中发掘出两个埙的残片。据发掘考察报告称：命名为绫罗木1号的埙“状呈卵形，……前面开有4孔，后面只保存有1孔，然而从残片的位置推断，应有另1孔存在，它与吹口部分均残缺。复原之后测定，全长7.1cm，最宽部6.4cm。指孔（也称音孔）为前开口，前孔为0.7cm—0.8cm，后面残孔孔径为0.6cm，吹口径推定为1.8cm。……”绫罗木2号埙“与1号埙相比较，胎土更为致密，体壁较薄。背部虽然破损，前半部分以及吹口部分都还保存完好，做工很细。复原之后测定，纵为7.0cm，最宽部为5.7cm，指孔径约为0.4—0.5cm，吹口径推定为1.8cm，较1号埙稍小”。“1号埙与2号埙都属于（弥生时代）前期中叶。由此可以看出早在弥生时代前期，已有在形制上呈倒卵形与上下两端呈锐状卵形、与中国先秦时代华北地区二里岗出土的陶埙相类似的埙出土。”⁽⁴⁾此后，在同一地区还发

现四个埙的残片，这四个埙“与1号、2号埙相比较，在形制上，特别是口径开得更大大，作为陶埙的机能已逐渐丧失”，“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这已经是变了形的埙，或许已经丧失了吹奏的机能”。⁽⁵⁾

根据上述调查报告可以大体上推断，埙这一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在日本弥生时代前期中叶即已传入日本，其形制与中国周代发达的埙大体相同，但是后来形制发生变化，逐渐丧失了作为乐器的功能，成为一种仅供观赏的器物。至于所以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尚需做进一步的研究。笔者的初步推断是，当时日本音乐尚处于萌始时期，它的整体水准，尚不允许它完整地接受在音律、旋律以及吹奏技法上业已相当发达和成熟的埙的艺术，因此才从最初传人的原样逐渐退化，恐怕铜铎的情况也与此相类似。⁽⁶⁾但是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能抹杀中日音乐文化交流在此时业已开始这一历史事实，只不过当时这种交流尚处于很低的水准，只能说是一个端绪。而真正意义上的中日音乐文化交流还有待此后中国隋、唐时代，即日本飞鸟、奈良、平安时代的到来。

注：

- (1) 参阅木宫泰彦著《日华文化交流史》，第30页。
- (2) 日本：《续日本纪》卷6，第53页。
- (3) 日本：《古代的日本第5卷—近畿—》，田中琢文。
- (4) 日本：《绫罗木乡遗迹发掘调查报告》第1集（本文篇），第588页。
- (5) 同上，第590页。

(6) 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学者笠原洁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具有多数指孔、并能发出多种旋律音的埙，之所以没能为日本所接受，是由于日本音乐文化特色的缘故。这是令人很感兴趣的问题。”见笠原洁著《音乐的历史与音乐观》，第156页。

目 录

前 言	(VII)
-----	-------

唐 代 篇

序 言	(3)
第一章 以遣唐使为中心的中日音乐交流活动	(5)
第一节 12次遣唐使团的活动概况以及音声长与音声生	(6)
第二节 遣唐使团中的音乐使者	(13)
1. 吉备真备 (695—775)	(13)
2. 藤原贞敏 (807—867)	(16)
3. 遣唐使团中其他音乐相关者	(31)
4. 唐代赴日中国音乐家及其活动	(37)
第三节 日本管理乐人活动的音乐机构: 雅乐寮、 内教坊与吹奏部	(40)
第二章 唐乐的导入及其日本化	(45)
第一节 唐燕乐及其向日本的导入	(45)
第二节 平安朝的乐制改革与唐乐的日本化	(57)

第三节	关于伎乐	(68)
第四节	踏歌与散乐	(78)
第五节	关于声明	(83)
1.	声明的语源	(83)
2.	声明传入日本	(83)
3.	声明的乐理及其与中国音乐的关系	(87)
4.	声明的记谱法	(90)
5.	声明的演唱样式	(95)
6.	声明使用的乐器	(96)
第六节	三韩乐、渤海乐以及天竺乐与中国音乐的关系	(98)
第三章	唐代乐器传入日本及其保存、应用与复原	(104)
第一节	唐代乐器传入日本	(104)
第二节	正仓院保存的唐传乐器	(110)
1.	金银平文琴	(110)
2.	瑟: 24弦、残缺	(113)
3.	箏: 4只、13弦、残缺	(114)
4.	箜篌: 2只、残缺	(114)
5.	琵琶: 5只	(115)
6.	螺钿紫檀五弦琵琶	(118)
7.	螺钿紫檀阮咸	(118)
8.	尺八: 8只	(119)
9.	箫	(120)
10.	横笛	(120)
11.	笙	(121)
12.	竿	(122)
13.	细腰鼓: 2个	(122)

14. 腰鼓: 22个	(124)
15. 方响	(124)
第三节 日本唐传乐器的应用与复原	(124)
第四章 唐代传入日本的中国乐谱	(134)
1. 《碣石调·幽兰谱》(古琴谱)	(134)
2. 《番假崇》(天平琵琶谱)	(138)
3. 五弦谱	(143)
4. 《琵琶诸调子品》	(148)
5. 《南官琵琶谱》	(152)
6. 《博雅笛谱》	(160)
7. 《仁智要录》	(163)
第五章 传入日本的中国音乐思想与音乐理论	(167)
第一节 礼乐思想的传入及其对日本的影响	(167)
第二节 音乐典籍的传入	(173)
第三节 中国音律理论的传入及其日本化	(177)

明 清 篇

第一章 明代的中日音乐交流	(191)
第一节 明乐传入日本概况	(192)
第二节 《魏氏乐谱》与传入日本的明乐	(194)
第三节 传入日本的明乐乐器	(204)
第二章 清代的中日音乐交流	(211)
第一节 清乐传入日本的经纬	(211)
第二节 传入日本的清乐	(218)

第三节	《九连环》与《茉莉花》的传承与变化·····	(226)
第四节	从明治时代日本新闻记事中看清乐的实际演奏状况·····	(238)
第五节	传入日本的清乐乐器及其演奏形态·····	(244)
第六节	清乐的变质与衰退·····	(251)
第三章	琴乐的复兴·····	(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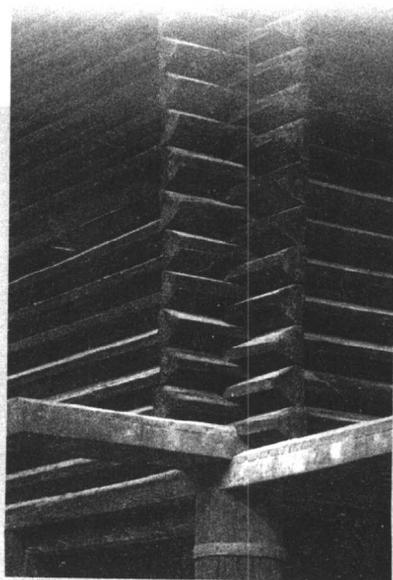
近 代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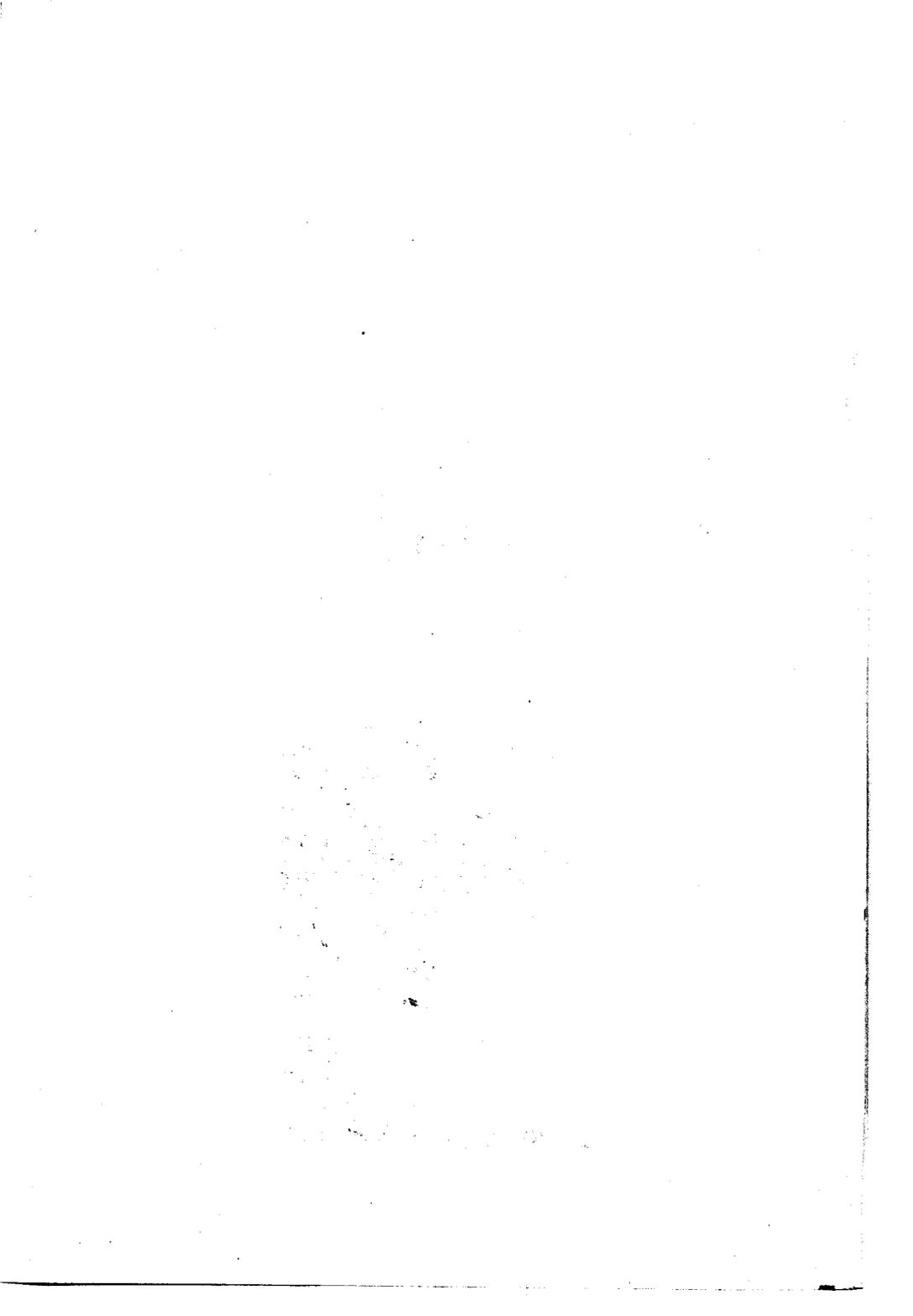
序 言·····	(274)
第一章 留日中国学生的音乐活动与对中国音乐近代化作贡献的日本音乐教育家·····	(276)
第一节 留日学习音乐的中国学生概况及其代表人物·····	(276)
1. 沈心工 (1870—1947)·····	(277)
2. 李叔同 (1880—1942)·····	(283)
3. 曾志忞 (1879—1929)·····	(286)
4. 辛汉·····	(288)
5. 萧友梅 (1884—1940)·····	(289)
第二节 留日中国学生音乐社团及其活动·····	(292)
1. 大同音乐会·····	(292)
2. 音乐讲习会和亚雅音乐会·····	(293)
3. 各种音乐演奏会·····	(295)
第三节 对中国音乐近代化作贡献的日本音乐教育家·····	(296)
1. 铃木米次郎 (1868—1940)·····	(297)
2. 渡边龙圣·····	(299)

3. 近森出来治	(300)
4. 河原操子 (1875—1945)	(304)
5. 其他	(307)
第二章 日本学校歌曲与中国学堂乐歌的比较研究	(309)
第一节 发生史的比较	(309)
第二节 音乐源流的比较	(313)
第三节 代表性作品的比较分析	(321)
1. 《手指游戏》——《体操—兵操》	(321)
2. 《蝴蝶》——《赛船》	(323)
3. 《樱井的诀别》——《何日醒》	(326)
4. 《霞耶云耶》——《体操（女子用）》	(328)
5. 《宿舍院中的旧吊桶》——《中国男儿》	(330)
6. 《日本海军》——《十八省地理历史》	(334)
7. 《萤之光》——《惜春归》	(337)
8. 《勇敢的水兵》——《革命军》	(339)
9. 《我等中学一年生》——《光复纪念》	(342)
10. 《骑兵》——《竹马》	(345)
11. 《远望》——《百花》	(347)
12. 《旅愁》——《送别》	(350)
第三章 通过日本传入中国的西洋音乐及其对中国音乐近代化 的影响	(355)
第一节 中国近代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创立与发展	(355)
第二节 西洋乐理在中国的介绍与出版	(357)
第三节 西洋记谱法，特别是简谱传入中国及其普及	(361)
第四节 风琴、钢琴等西洋乐器传入中国及其应用	(364)
第五节 群众唱歌等新音乐样式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音	

乐生活产生的影响·····	(367)
结 语·····	(370)
附录1 东京音乐学校中国留学生名簿·····	(372)
附录2 《东京音乐学校一览》第38—39页(复印件)·····	(379)
附录3 1902—1920年间东京音乐学校中国留学生统计表···	(380)
附录4 1902—1920年间东京音乐学校中国留学生毕业生修了 生名簿·····	(382)
附录5 清末各省官费私费留日学生姓名表(只摘音乐相关者) ·····	(383)
全书结束语·····	(386)

唐代篇





序 言

唐代（618—907）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发达与繁盛的时代，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在世界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对当时的亚洲邻国产生了强大的影响。此时，日本正处于飞鸟时代后期、奈良时代与平安时代前期，是日本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代。为了国家的发展和革新，继遣隋使之后，日本又在264年之间接连不断地派出遣唐使，全面导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的成果，巩固了日本中央集权国家的基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当时中日之间的交流，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家间的全面交流。当时的人们为了这个交流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与牺牲，其精神与业绩是极为感人的。根据日本史书的记载，遣唐使团的木船在波涛汹涌的浩瀚海面上时有劫难，许多优秀的人才牺牲在旅途之中。这里仅举其中两例为证。

日本孝德天皇白雉四年（653）：“秋七月，被遣大唐使人高田根麻吕等，於萨麻之曲、竹岛之间合船没死。唯有五人，系胸一板，流遇竹岛，不知所计。五人之中，门部金采竹为筏泊于神岛。凡此五人经六日六夜，而全不食饭。……”⁽¹⁾

日本圣武天皇天平十一年（739）十一月，遣唐使团完命归国时，“四船同发，从苏州入海。恶风忽起，彼此相失。广成之

船一百一十五人漂着昆仑国。有贼兵来围遂被拘执，船人或被杀或遂散。自余九十余人着瘴死亡。广成等四人仅免死，得见昆仑王……”。⁽²⁾

音乐作为文化的一个领域，在当时的中日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遣唐使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学习唐朝的礼乐制度和音乐歌舞艺术。为此目的，遣唐使团特别任命了擅长音乐的官吏，并且专门派遣了音声长和音声生，进行音乐方面的交流活动，并获得丰硕的成果。仿照唐朝的礼乐制度，日本宫廷也设置了雅乐寮、内教坊等掌管音乐的机构，以日本宫廷为中心开展了频繁的音乐演奏和教育活动。特别是学习唐代宫廷燕乐，创立日本自己的雅乐，同时大量导入唐代乐器、乐谱、乐书等，并逐渐加以消化吸收，使日本音乐极大地丰富与繁荣起来。唐代，即日本奈良、平安时代前期，是中日音乐交流史上最光辉的篇章。

注：

(1) 日本：《日本书纪》卷25，第254页。

(2) 日本：《续日本纪》卷13，第156页。